

延续与革新：“2·20”运动与摩洛哥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

孟 瑾**

内容提要 “2·20”运动的爆发将摩洛哥卷入“阿拉伯之春”的旋涡。摩洛哥通过宪政改革及时回应了民众政治改革诉求，调整了摩洛哥政治权力关系和政党力量对比，重新定义了摩洛哥身份认同的构成要素，使摩洛哥走上政治体制改革的快车道。但是，摩洛哥政治权力中心依旧由摩洛哥王室占据，政党的边缘化地位没有改变，摩洛哥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仍将长期存在。“2·20”运动拓展了摩洛哥传统政治空间和政治参与模式，摩洛哥民众日益注重通过社会运动和网络空间实现与国家权力的互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给摩洛哥带来的更为深层的变化。当今形势下，如何把握传统宗教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平衡，强化政党的政治功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是摩洛哥民主化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摩洛哥 “阿拉伯之春” 宪政改革 正义与发展党 柏柏尔文化

2010年底，一名突尼斯商贩的自焚在阿拉伯国家引起了连锁反应，中东多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治理不力，要求政府移交政权。突尼斯、埃及等国政府纷纷倒台，陷入政治混乱。这场抗议政府专政、呼吁民主改革的社会运动被西方国家称为“阿拉伯之春”。^①但是，“阿拉伯之春”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民族问题与非洲发展研究”创新项目阶级性成果。

** 孟瑾，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有关中东剧变的研究成果参见 Amin Samir, “2011: le printemps arabe?” *Mouvements*, Vol. 3, No. 67, 2011, pp. 135 – 136; Gelabert Esther, “Le Printemps arabe en Perspective,” *Cahiers de l'action*, Vol. 2, No. 39, 2013, pp. 11 – 17; Eugène Berg, “Le printemps arabe, (转下页注)

并没有给阿拉伯国家民众带来实质性的改革,反而使政局陷入一种“无序”状态,给多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摩洛哥也被卷入了剧变的旋涡。2011 年初,摩洛哥民众在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上设立专门网页,要求改变摩洛哥专制的政治现状、限制国王的政治权力、建立“统而不治”(monarchie non gouvernante)的君主立宪制。2011 年 2 月 20 日,数十万民众以“自由、尊严、公平”为口号在拉巴特、丹吉尔、马拉喀什等近百个城市和乡村组织街头抗议活动,呼吁限制国王权力,惩治腐败,解决贫富分化、失业率高、民生问题,被称为“2·20”运动。由于“2·20”运动的目的不是颠覆王权,并且国王及时采取宪政改革回应社会诉求,这场剧变没有给摩洛哥带来政治混乱,而是发展成一场“安静的革命”。^①但是,这场运动暴露了摩洛哥政治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成为摩洛哥宪政改革的催化剂,其激发出的社会活力推动着摩洛哥政治变革。本文试图在分析“2·20”运动对摩洛哥政治体系影响的基础上,阐述十年来摩洛哥政治生态的延续与革新,并探究摩洛哥未来政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2·20”运动对摩洛哥政治体系的影响

“2·20”运动爆发后,摩洛哥国王没有采取强硬的镇压政策,而是通过宪政改革化解了这场社会运动可能带来的政治危机。2011 年 7 月颁布的新宪法重新限定了国王的权力,规定国王从众议院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中任命首相。11 月,摩洛哥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温和派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Parti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 下称“正发党”)胜出,开创了伊斯兰力量执政的新局面。

(接上页注①) secousse géoéconomique majeure,” *Géoéconomie*, Vol. 2, No. 65, 2013, pp. 207 – 221; 王震《“阿拉伯之春”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6 期,第 15 ~ 19 页; 王刚《从所谓“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 年第 11 期,第 26 ~ 29 页; 刘勃然《“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回眸》,《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第 14 ~ 18 页; 庄晨燕《北非“阿拉伯之春”对民族国家建构之启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第 51 ~ 59 页。

① Dominique Lagarde, “La révolution tranquille du Maroc,” *L'Express*, November 23, 2011, https://www.lexpress.fr/actualite/monde/la-revolution-tranquille-du-maroc_974671.html.

（一）通过和颁布新宪法，进一步明晰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2·20”运动爆发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主动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来平息这场可能颠覆现有政治秩序的社会运动。2011年3月9日，穆罕默德六世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这是摩洛哥现代历史上国王首次在非国庆日发表演讲。国王在演讲中承诺成立制宪委员会来商议修改现行宪法，起草新宪法，推行全面的宪政改革。6月17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再次向摩洛哥人民发表讲话，宣布新宪法草案并呼吁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全民公投，行使公民权利。7月1日，摩举行新宪法草案全民公决，72%的选民参加投票，以98.5%的支持率通过了新宪法。7月29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颁布新宪法。

新宪法在程序上和内容上相对于以往宪法有以下区别。首先，为保证宪法制定过程的公正性，新宪法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制宪委员会商议起草。制宪委员会主席为摩洛哥著名宪法专家、大学教授阿卜杜勒夫·门努尼（Abdeltif Mennouni），其成员包括高校和社会团体代表、维护人权活动家等。这是摩洛哥独立以来第一次成立公开的、没有政治力量干预的制宪委员会。^①其次，新宪法明晰了王室的统治权限，限制了国王的行政权力，首相和议会的权力和职权范围得到扩大。以往宪法中的“国王神圣不容侵犯”更改为“国王的人身不容侵犯”^②，以示将国王与其所代表的权力加以区分。首相不再由国王直接任命，而是“在众议院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中考虑个人的得票结果任命”。作为政府首脑，首相拥有提名和罢免大臣、领导政府实施政府规划等重要权力，有权要求众议院和参议院对其提案进行表决投票。议会权力得到加强，议会拥有唯一立法权，有“表决法律、监督政府活动并评估公共政策”的权力和责任。再次，宪法保障和加强司法独立性。宪法规定“法院在履行司法职责过程中不受任何命令或指示”干预。以往宪法规定，法律条文以国王的名义颁布和实施。而2011年宪法限制了国王对司法的干涉，仅规定“国王是司法权独立的保障人”，“法官若认为

① Bernabé Lopez Garcia, *Le Maroc et le printemps arabe dans un monde en plein changement*, Barcelone, IEMed, 2012, p. 13.

② 本文有关摩洛哥宪法的表述均参考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非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第614~626页。

其独立性受到威胁,必须向最高司法权委员会申诉”。此外,宪法将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一同认定为官方语言,将其视为所有摩洛哥人的共同遗产,保护和发展摩洛哥多元文化表达。与此同时,新宪法重视人权问题,强调保障基本自由和权利,特别是思想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平示威自由、结社自由等。

新宪法改革体现了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试图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开放态度,对摩洛哥政治稳定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一,回应了民众的政治社会诉求,有效平息了社会运动,阻止其演化为暴力冲突,使摩洛哥避免了埃及和突尼斯所经历的政权倒台;其二,新宪法推动了摩洛哥民主化进程,提升了政党的选举合法性,加强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为其提供了更多参与和影响摩洛哥政治发展的机会。

国王通过修改宪法达成政治妥协,以和平方式深化政治改革,使摩洛哥成为北非国家中的特例。尽管新宪法规定摩洛哥国王仍是国家元首、宗教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以及政治生活的最高仲裁者,但摩洛哥国王在遵守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基础上主动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移交给世俗机构,明晰三者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在向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宪政民主道路上迈出一大步。

(二) 政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伊斯兰性质政党正发党上台执政

根据新宪法,国王将从议会选举胜出的政党中任命总理。原定于 2012 年的议会选举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提前举行。伊斯兰性质政党正发党在此次选举中胜选开创了伊斯兰力量执政的新局面,给摩洛哥政局带来了新气象。

“2·20”运动爆发后,众议院选举在新宪法刚出台的背景下举行。为确保此次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摩洛哥王室决定不再对选举进行干涉,而是任命新的独立选举委员会,由内政部全权负责,采用更公平的选举分配。此次选举投票率为 45%,较往届选举有所提升。伊斯兰政党正发党获得最高支持率,赢得了 395 个席位中的 107 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一政党。而颇有影响力并于 2007 年组阁的民族主义政党独立党 (Parti de l'Istiqlal) 由于没能成功解决摩洛哥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民众支持率下降,仅获得 60 个席位。保皇派政党全国自由人士联盟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es indépendants)

和真实性与现代党 (Parti authenticité et modernité) 分别位居第三 (52 个席位) 和第四 (47 个席位), 左翼政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 (Union socialiste des forces populaires) 排名第五。根据新宪法, 该党总书记阿卜杜拉·本·基兰 (Abdelilah Benkirane) 被国王任命为政府首脑。2012 年 1 月, 正发党同独立党、人民运动 (Mouvement populaire)、前摩洛哥共产主义政党进步与社会主义党 (Parti du progrès et du socialisme)、宪政联盟 (Union constitutionnelle) 组成新政府, 而真实性与现代党、全国自由人士联盟、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拒绝加入本·基兰领导的政府。^①

正发党是温和的伊斯兰政党, 拥护君主统治, 主张实行渐进的社会变革, 惩治腐败。其有效的政治经济政策在历史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好评。但由于国王担心其强劲势头威胁到由王室垄断的执政自主权, 长期以打击恐怖主义和保障国家安全为由防范和打压有伊斯兰背景的正发党参政执政, 通过不透明手段限制正发党在 2002 年、2007 年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此次正发党通过透明选举上台执政反映了民众对正发党执政能力的认可与信任, 也说明了国王进一步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决心, 以及通过包容伊斯兰政党来增强自身合法性的意图。

正发党之所以得以执政, 一方面因为该党提出的改革方案符合摩洛哥人民需求, 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 正发党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和组织管理, 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此外, 正发党没有参与“2·20”运动, 主张在维护政权稳定和承认王室合法性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不断谋求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 随着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势头减弱, 国王不能继续以此为由限制其参政执政。“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政治转型契机使王室认识到扩大政治参与是维护统治和社会稳定的正确道路。

正发党上台执政重组了摩洛哥的政治格局, 为摩洛哥的政治发展带来新气象。伊斯兰政党历史上首次执政, 改变了以往的政治路线。正发党以实用主义为指导, 弱化其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 积极采取政治经济改革措施, 重新燃起民众对摩洛哥未来的期望。

① 李杉:《浅析北非剧变与摩洛哥政治改革》,《西亚非洲》2013 年第 2 期,第 146 页。

(三) 重塑摩洛哥国民身份认同，柏柏尔语被列为官方语言

柏柏尔族是摩洛哥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以柏柏尔语为日常通用语言的居民占摩洛哥总人口的 30% 以上。80% 以上的摩洛哥人既讲阿拉伯语又讲柏柏尔语。历史上，柏柏尔文化通常与原始、野蛮、反叛、异端等负面描述联系在一起。为避免带有歧视性的负面描述，柏柏尔人自称为阿马齐格人 (Amazigh)。在摩洛哥被确立为法国的保护国以前，柏柏尔社会以部落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聚居于远离中央政权的山区，与直接受苏丹统治的马赫赞形成二元对立的状态。^①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殖民统治者推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有意强调保留和发扬柏柏尔人的文化与习俗，加剧了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对立。独立后，在内阁中发挥中心作用的独立党实行集权主义政策，在民族国家构建中摒弃多元主义。^② 1962 年出台的宪法规定摩洛哥的身份认同基础为国王、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语言文化，并且规定阿拉伯语是摩洛哥唯一的官方语言。阿拉伯—穆斯林元素成为摩洛哥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柏柏尔语言文化被排斥在摩洛哥身份认同之外。柏柏人不仅文化上被政府忽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日益被边缘化。独立以来，摩洛哥政府重点发展城市和沿海地区，而对柏柏尔人集中的山区经济投入不足，以致该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落后。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摩洛哥政治紧张氛围日渐宽松，柏柏尔人通过建立社会团体、组织文化运动，要求将柏柏尔语列为民族语言，将柏柏尔文化纳入摩洛哥身份认同，并设立专门机构保护柏柏尔文化。1999 年，穆罕默德六世上任后开始意识到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并采取以保护柏柏尔人及其利益为目标的措施，于 2001 年成立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 (Institut royal de la culture amazighe)，将柏柏尔语引入教育体系，创建阿马齐格语频道等。^③ 但由于投入的资源有限和各种实际困难，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① 高文洋、韩志斌：《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缘起与嬗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35 页。

② 参见 Benjelloun M. O. , *Projet national et identité au Maroc, essai d'anthropologie politique*, Paris, L'Harmattan, 2002。

③ Bennis Said, "The Amazigh Ques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Morocco," July 20, 2009, <http://arab-reform.net/spip.php?article2245&lang=en>.

2011年的“2·20”运动为阿马齐格人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契机。阿马齐格运动（Mouvement Amazigh）与伊斯兰主义运动“正义与行善”会（Al-Adl Wal Ihsane）、民主左翼联盟同为“2·20”运动的发起者，在支持推进民主改革、改善民生等总体目标的同时，呼吁政府关注柏柏尔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问题、保障柏柏尔人作为摩洛哥主要少数民族的权利，并要求宪法承认柏柏尔文化是摩洛哥多元身份认同的重要构成。由于柏柏尔语言和文化在摩洛哥身份认同中的地位问题直接关系到摩洛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且柏柏尔人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诉求与“2·20”运动所提倡的民主价值观相契合，因此，柏柏尔人的诉求得到了示威者的普遍支持。^①国王意识到久拖未决的身份认同问题若进一步发酵便可能威胁政权稳定，在2011年3月9日演讲中首先对此做出回应，表示“新宪法草案将承认摩洛哥国民身份认同的多样性，柏柏尔文化作为所有摩洛哥人的共同遗产在摩洛哥民众身份认同中处于中心位置”^②。2011年7月出台的宪法重塑了摩洛哥国民身份认同构成，承认柏柏尔语为摩洛哥官方语言之一，打破了阿拉伯文化是摩洛哥身份认同唯一来源的现状，实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除此之外，新宪法承认摩洛哥国民认同在以阿拉伯—伊斯兰、柏柏尔和萨哈洛—哈桑尼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融合了非洲、安达卢西亚、希伯来和地中海文明。新宪法在维护国家统一、不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保护，不仅有利于摩洛哥内部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而且有利于促进摩洛哥与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和谐关系。^③

二 摩洛哥政治生态的延续性

2011年新宪法及时回应了民众政治改革诉求，调整了摩洛哥政治权力

① Mari Oiry-Varacca, “Le ‘printemps arabe’ à l’épreuve des revendications amazighes au Maroc,” *l’espace politique*, Vol. 18, No. 3, 2012. DOI: <https://doi.org/10.4000/espacepolitique.2504>.

② “Discours du roi Mohammed VI du Maroc: le texte intégral,” Rue 89, November 15, 2016, <https://www.nouvelobs.com/rue89/rue89-monde/20110310.RUE1228/discours-du-roi-mohammed-vi-du-maroc-le-texte-integral.html>.

③ 作为摩洛哥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犹太元素有助于摩洛哥通过“接触政策”维持和推进与以色列的良好关系。参见张玉友《摩洛哥对以色列“接触政策”中的犹太人因素考察》，《西亚非洲》2021年第2期，第96~120页。

关系和政党力量对比,使摩洛哥步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快车道。但是,摩洛哥政治权力中心依旧由摩洛哥王室占据,政党被边缘化的现状没有改变,摩洛哥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一) 摩洛哥国王的合法性基础没有被撼动,国王依旧占据权力中心

实现政治统治最根本的工具是忠诚或者说是合法性。^①“阿拉伯之春”蔓延阿拉伯世界多国的原因是国家政权丧失了合法性。摩洛哥王室享有涵括历史、宗教、传统、现代等多维度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摩洛哥君主地位已深入人心,“2·20”运动并未质疑国王的合法性,而是在保留王室合法地位的基础上要求限制国王权力。

摩洛哥王室的合法性来源主要有四。其一,君主制传统。在君主制体制下,历史传承下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是王室实现对臣民统治的基础。从第一个王朝伊德里斯王朝至今,摩洛哥经历了长达 12 个世纪以上的君主制统治。现今摩洛哥国王的统治可回溯到 1664 年以来阿拉维王朝的统治。为了巩固君主制统治的合法性,摩洛哥国王历来强调君主制的历史延续性,并且这种已被神圣化的天然权威已成为君主实现统治的最好依据。其二,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政治中,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威是分不开的。摩洛哥国王自封为“信士的长官”(Commandeur des croyants),通过彰显其穆斯林首领和宗教领袖身份将统治权神圣化,为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同时,摩洛哥国王将家族身世追溯到第四任哈里发阿里,自称阿拉维家族是穆圣的后裔,以获得建立在神圣宗教基础上的内在合法性。^②其三,现代合法性。摩洛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国王积极推行现代民主政治,允许政党参政议政,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摩洛哥较快走上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尽管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但在国王的领导下,摩洛哥通过现代化改革和尝试实现了经济平稳发展,政治社会基本稳定。另外,在国家治理中,国王强调宪法的作用,力图建立法治国家。尽管宪法是国王

① [美] 乔尔·S.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3页。

② 胡雨:《“阿拉伯之春”与中东君主制国家政治稳定》,《国际论坛》2014年第2期,第65页。

意志的体现，但宪法为国家机构的运转提供了法理依据和法治保障。以现代化理念为指导的施政方针为王室提供了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其四，国王的个人魅力。国王的个人领导才能和品格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政权合法性。国王精于国政、体恤民情等品质加固了其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而仁爱、虔诚等美德更为其政治统治罩上了光环。穆罕默德五世因反抗法国对摩洛哥的控制而遭法国总督废黜和流放，使其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被誉为“独立之父”。哈桑二世在执政时期通过发起“绿色进军”收复西撒哈拉大部分领土而获得“国家统一者”称号。穆罕默德六世则因重视民生问题、关心民众疾苦而被民众称为“穷人的国王”。^① 国王的个人魅力和突出贡献使其成为“克里斯马式”的领袖，加强了其合法性来源。国王长期铸就的多维度合法性基础不会轻易被一场社会运动所撼动。“2·20”运动爆发后，摩洛哥王室统治以积极开放的姿态推进改革是穆罕默德六世体恤民情执政风格的体现，使摩洛哥政权的合法性再一次得到巩固。

（二）王室与政党的关系没有变，政党继续相互掣肘

政党在摩洛哥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62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摩洛哥实行多党制。以国王控制下的多党君主立宪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是摩洛哥民主政治的体现。但是，在以国王为中心的君主制政治体系中，国王通过必要的政治手段在鼓励政党参与政府事务的同时将其控制在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② 与此同时，尽管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后将大量年轻技术官僚引入政界，但政党权力依旧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削弱了政党在民众中的合法性。

在摩洛哥的政党政治光谱中，左翼政党分为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等支持王权、参与组阁的政党，以及民主之路党等反对王权、拒绝进入内阁的极左政党。^③ 而右翼政党通常是国王为制衡民族主义政党独立党和其他左翼政党而创建的，如哈桑二世时期创建的人民运动、

① 曾爱平：《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统治合法性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4期，第21~22页。

② 张玉友、孙德刚：《摩洛哥政党治理的理念与实践》，《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5期，第88页。

③ 易小明：《转型时期的摩洛哥左翼政党》，《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第122页。

宪政联盟、全国自由人士联盟、穆罕默德六世时期创建的真实性与现代党等。^①

然而,政党在政府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国王一直处于摩洛哥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国王的长期压制下,政党难以自主发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为满足民众的政治诉求,国王表现出更加民主开放的政治姿态,通过修改宪法赋予政党更大的生存空间,将权力下放给政府。对政党的开放态度回应了民众要求推进民主改革的呼声,给君主统治披上了民主外衣,巩固了国王的政治合法性。然而,国王依旧保留了主持由首相和部长组成的部长会议(Conseil des Ministres)和罢免部长的权力。在摩洛哥新组建的政府中,国防、外交、宗教、内政部等重要职位均由国王亲信或者亲王室的政党把持。即使占有多数席位的正发党除政府首相之外也仅担任政府中的边缘职位。可见,政党在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受到国王意志的左右,仅是后者的执行者。

此外,作为政客追逐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政党因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和扎实的党内建设呈现分裂性和脆弱性,经常出现意见不合、相互掣肘的情况,难以实现有效的政治治理。由于政党仅以分享政治权力为目的,而不代表民众利益,民众普遍缺乏对政党的信任。民众参与议会选举的积极性不高,议会选举历年的投票率没有超过 50%。这表明民众对以政党为主体的代议制政府的执政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尽管“阿拉伯之春”后,政党在政府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民众深知政党为王室集团马赫赞所控制,不能主导摩洛哥的政治生活。并且,民众与国王之间的天然亲近感使国王的合法性及中心地位不可撼动,政党在摩洛哥政治治理中的边缘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2016 年 10 月,摩举行“阿拉伯之春”以来的第二次众议院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正发党获得 125 个席位,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右翼政党真实性与现代党获得超过 102 个席位,其他政党所得席位均在 50 个以下,其中独立党得票率再次下滑,仅获得 46 个席位。但由于政党间政见不合,时任党总书记本·基兰组阁失败,遭到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罢免。国王任命正发党二号人物萨阿德丁·奥斯曼尼(Saad-Eddine El Othmani)为首相,负

① 张玉友:《当前摩洛哥国内政党形势:分裂与崛起》,《当代世界》2018 年第 4 期,第 63 页。

责组阁。经过谈判和妥协，亲王室的全国自由人士联盟、人民运动和传统左翼的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最终同意与正发党组成新一届联合政府。至此，持续了五个多月的“无政府状态”才得以结束。此次组阁失败说明正发党内部以及各党派之间分歧严重。而国王超越宪法规定罢免并重新任命首相的做法则反映出国王在政治生活中依然保有强大的干预权力。

（三）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障碍，经济改革成效不佳

摩洛哥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长期以来困扰摩洛哥发展稳定的主要问题。“2·20”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是要求政府采取经济改革措施，以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为回应这一诉求，政府在2011年宪法改革中提出改变寻租型经济、根除腐败现象等措施。然而，这些措施最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摩洛哥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依旧突出，经济发展仍面临结构性障碍。

1956年独立后，摩洛哥通过“摩洛哥化”实现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努力发展民族经济。1983~1993年，摩洛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实行结构调整计划，制定了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的配套政策。^①结构性调整计划加快了摩洛哥对外开放的步伐，但收紧公共服务支出的政策也造成公共服务和教育部门发展落后等问题。穆罕默德六世国王自1999年登基以来，注重发展经济，采取多项改革措施推进摩洛哥经济多元化和现代化。在农业、能源、工业领域先后推出了“绿色摩洛哥计划”、国家能源战略、“工业加速计划”等发展规划，刺激经济发展和推动结构改革。^②穆罕默德六世统治以来，摩洛哥经济连续实现了正增长（2020年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摩洛哥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7%）。

然而，受各种因素制约，摩洛哥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农业和旅游业仍是摩洛哥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并且面

① 独立后摩洛哥经济发展阶段参见肖克《列国志·摩洛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43~156页；张玉友《国家资本主义在摩洛哥》，《文化纵横》2020年第2期，第104~113页。

② 李立：《非洲经济独立摩洛哥实践》，《中国投资》2019年第24期，第24~25页。

临失业率居高不下、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① 摩洛哥失业率常年保持在 9% 的较高水平,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摩经济发展放缓, 失业率攀升至 12% 以上。^② 青年问题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2019 年阿拉伯晴雨表显示, 18 ~ 29 岁的摩洛哥青年中, 70% 希望离开摩洛哥。60% 接受过高中和大学教育的青年渴望离开摩洛哥。^③ 这一数据表明摩洛哥青年群体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悲观态度以及摩洛哥社会的脆弱性和排斥性。

面对这些问题, “2 · 20” 运动提出一系列经济改革要求, 例如: 改变寻租型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命脉由家族垄断的现状、优先发展有利于促进就业的产业、依法惩治贪污和挪用公款行为等。作为回应, 政府于 2011 年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如: 提高用于支付地方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员工资的财政拨款, 上调最低工资和退休补助, 将失业毕业生吸纳到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就业, 等等。^④ 尽管这些财政措施一时缓解了抗议民众的愤怒情绪, 但没有改变摩洛哥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结构。在后 “2 · 20” 运动时期, 摩洛哥经济发展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观, 低就业率、财政收支失衡、医疗教育资源短缺等结构性问题依旧存在。因此, 为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打破寻租型经济发展模式、改变集权式经济管理模式等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

三 摩洛哥政治生态的新特征

“阿拉伯之春” 对摩洛哥政治体制没有造成实质性冲击, 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权力结构。但是, “2 · 20” 运动拓展了摩洛哥传统政治空间和政

-
- ① Evan Sandberg and Seth Binder, *Mohammed VI's Strategies for Moroc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132.
 - ② Communiqué de presse No. 20/388, “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FMI achève les consultations de 2020 au titre de l'article IV avec le Maroc,” Fond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23 décembre 2020, <https://www.imf.org/fr/News/Articles/2020/12/23/pr20388-morocco-imf-executive-board-concludes-2020-article-iv-consultation>.
 - ③ “Morocco Country Report,” 2019, Arab Barometer, https://www.arab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ABV_Morocco_Report_Public-Opinion_Arab-Barometer_2019.pdf, p. 11.
 - ④ Hicham Attouch, “Gouvernance économique et exigences du développement au Maroc à l'heure du printemps arabe,” *Revue marocaine de recherche en management et marketing*, No. 9 – 10, janvier-décembre 2014, pp. 515 – 532.

治参与模式。摩洛哥民众日益注重通过社会运动和网络空间表达其政治诉求、实现与国家权力的互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给摩洛哥带来的更为深层的变化。

（一）民众抗议常态化，社会运动成为表达社会诉求的主要方式

随着摩洛哥政党的社会地位持续下降，大部分摩洛哥民众不认为选举是推动改革的有效方式。“2·20”运动成功向摩洛哥政权施压，迫使其推行政治制度改革，使摩洛哥民众意识到社会运动的力量并将社会运动看作与国家权力制衡的重要方式。“2·20”运动拓展了新的政治参与空间，使民众跳出了王室与政党之间的争夺博弈，借助街头运动表达其社会诉求。

“2·20”运动以来，摩洛哥民众游行和抗议次数猛增，并且涉及不同社会阶层和领域。抗议活动具有组织性强、动员范围广的特点，其社会诉求基本得到了政府回应。例如：为抗议政府禁止在城市街边摆摊的政策，在贝尼梅拉尔（Béni Mellal）市的流动商贩号召下，各地商贩参加于2014年9月13日举行的全国流动商贩会议，提出“全国流动商贩联合起来”。政府担心运动引起连锁反应，决定自2015年起向每个省份拨款6亿迪拉姆用于资助建立覆盖市场和三轮送货车。2015年，实习教师全国协调会在首都拉巴特举行动员大会，号召通过罢课、静坐或游行的方式抗议政府不公的遴选政策和缩减奖金法案，最终促使政府撤回了相关法案。除此之外，摩洛哥民众还通过社会运动抵制高价水电、提高中学考试公平性等。^①

2016年10月在里夫地区（Rif）爆发的大规模希拉克（Hirak）运动，将摩洛哥社会运动推向高潮。这次街头抗议活动持续时间长并且影响面广，被视为第二波“阿拉伯之春”。希拉克运动起因与2011年突尼斯社会运动类似，一名渔民商贩为了夺回被警察没收的鱼被卷入垃圾车而丧生。事发经过在互联网上广为散播，激起了民众的愤怒。^②这一事件在摩洛哥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背景下持续发酵，在里夫地区引发了一

① Mohamed Naimi, “L'évolution de l'action collective au Maroc depuis 2011: du politique au social,” dans Abdallah Saaf (dir.), *Mutations politiques comparées au Maghreb et au Machrek 7 ans après le printemps arabe*, Rabat, OCP Policy Center, 2018, pp. 29–32.

② “Maroc: qu'est-ce que le mouvement contestataire ‘al Hirak’?” Rtl, 28 juin 2018, <https://www.rtl.fr/actu/international/maroc-qu-est-ce-que-le-mouvement-contestataire-al-hirak-7793909049>.

系列以扩大经济发展机遇、改善医疗卫生水平、完善基础设施服务为目的的社会抗议。

与此同时,此次运动集中于柏柏尔人聚居的北部里夫地区,其主要诉求之一是要求中央政府财政向里夫地区倾斜,关注该地区发展,维护柏柏尔人利益。历史上,在里夫地区爆发了多次抵制中央政府政策的社会运动。^①20 世纪 20 年代,里夫地区要求摆脱西班牙和法国殖民统治者的控制,试图成立“里夫共和国”。^②1958 年,该地区居民为反抗外国的军事占领和政府的边缘化政策组织起义。刚独立的摩洛哥政权因担心领土的完整性受到分离主义分子的威胁予以武力镇压,大量里夫地区居民惨遭杀害。^③哈桑纳二世统治时期继续对里夫地区实施压制和边缘化政策。为缓解地区局势,平衡地区发展,穆罕默德六世推出维护柏柏尔人利益的多项改革措施,如:加强该地区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2001 年成立皇家阿马齐格文化学院,2011 年将柏柏尔列为官方语言,等等。然而,这些举措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柏柏尔人聚集的北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柏柏尔文化边缘化问题,希拉克运动成为柏柏尔人群体表达其经济政治文化诉求的契机。

希拉克运动反映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失衡的现象在摩洛哥普遍存在,其诉求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响应。民众普遍认为自 2011 年伊斯兰政党正发党执政以来公共服务、民主改革等方面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使公众丧失了对政党的信任,通过社会运动表达诉求。尽管与邻国相比,2011 年以来摩洛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上升。然而,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主要隐患。高失业率暴露了摩洛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由于经济发展活力有限,青年毕业生难以及时被劳动市场吸纳,大量失业青年成为社会高危人群,也构成了希拉克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另外,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政府不作为,也是希拉克运动的主要诱因。

① Omar Bendjelloun, “Le RIF, un “volcan” méditerranéen,” *Les Cahiers de l'Orient*, No. 129, Vol. 1, 2018, pp. 89 – 96.

② Consulter Vincent Courcelle-Labrousse et Nicolas Marnié, *La guerre du Rif, Maroc, 1921 – 1926*, Paris: Tallandier, 2008.

③ Hsain Ilahian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erbers Imazighen*,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6, p. 107.

可见，此次在里夫地区爆发的社会抗议活动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既反映了在摩洛哥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又是柏柏尔人与中央政权长年积累的历史矛盾的集中爆发。不可否认的是，街头抗议等社会运动已成为民众表达社会诉求、揭露政府机构运转问题的主要方式。社会运动能够让政府机构了解社会诉求，促进改革措施的出台，但是以缓和社会矛盾为目标的改革措施通常是表层的、短效的，难以触及摩洛哥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二）社交网络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途径

从“2·20”运动的发起和组织过程可以看出，社交网络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社交网络为政治表达和辩论提供了开放性平台。自“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发后，摩洛哥民众在社交网络上创建了上百个社会动员网页和政治辩论小组。普通摩洛哥民众在博客上发表政治言论、散播宣传图片、就关心的政治议题进行探讨。其次，社交网络在组织社会运动中能有效动员民众，成为高效的交流互动平台。与传统媒体不同，网络媒介不仅能迅速发起游行号召，说服和动员民众，而且可以实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导向之间的即时对话和交流。“2·20”运动期间，左派代表和伊斯兰主义运动领导人通过在社交网络上就政治立场、行动模式及诉求口号进行协商并实现和解与联合。^①

“2·20”运动掀起的社交网络狂热一直延续至今。社交网络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途径。在传统媒体被国家权力垄断的环境下，社交网络承载着社会对政权的不满和诉求，也成为社会矛盾宣泄的出口和平行于政党组织的政治力量，在制衡国家权力，动员社会力量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例如：2016年爆发的希拉克运动，2018年4月爆发的为抵制高物价、低购买力的企业罢工运动都利用了网络平台的传播功能。

然而，通过社交网络进行社会动员有一定局限性。社交网络发挥作用需要一定前提条件。大部分在社交网络上参与政治辩论和动员的青年普遍

① Sakhi Montassir, “Le mouvement du 20 février, une révolte virtuelle ?” dans Baudouin Dupret et al. (dir.), *Le Maroc au présent: D’une époque à l’autre, une société en mutation*, Casablanca, Centre Jacques-Berque, 2015, pp. 668 – 669.

有过在传统公共空间中参与政治辩论的经验并已受到一定的政治熏陶,而政治敏感度较低的大众难以被社交网络触及。另外,大多数选择在社交网络上发声的民众不愿参与线下的集会游行活动。在“2·20”运动中的大部分民众由于害怕政府的打压,选择仅在社交网络上进行声援而没有加入游行队伍中。

需要注意的是,面对社交网络上民众高涨的反抗情绪,摩洛哥政府采取了与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不同的应对措施。摩洛哥政府没有强行关闭抗议者的脸书账号或切断网络,而是允许社交网络的政治辩论,一方面是迫于欧盟等国际组织谴责其侵犯言论自由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为更好地管控和评估抗议者的动员能力。摩洛哥政府一方面通过筛选和管控辩论内容来控制社交网络政治动员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创建相对应的宣传网页来引导社会舆论,营造有利于维护政权合法性的舆论氛围。^①

(三) 身份认同政治化成为扰动摩洛哥的政治稳定

“2·20”运动爆发后,摩洛哥政府出台新宪法,将柏柏尔语纳入官方语言并承认柏柏尔语是摩洛哥人的共同遗产。与此同时,宪法规定通过出台“组织法确定这一语言的官方性的实施过程,并确定其进入教育和公共生活有限领域以发挥官方语言功能的方式”。然而,事实上,相关组织法的出台过程阻力重重。直到2019年6月,摩洛哥议会才通过有关普及柏柏尔语的组织法。该组织法规定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公共服务部门使用柏柏尔语并在学校及文化部门教授柏柏尔语。^②该组织法的出台是推进柏柏尔语官方化的一大步,改变了自哈桑纳二世以来以阿拉伯语为中心的单一身份认同。尽管柏柏尔人认为该组织法具有一定模糊性,但是柏柏尔语最终被认可为官方语言无疑提升了柏柏尔人的社会文化地位,也为柏柏尔人进一步争取政治经济权利准备了条件。

① Sakhi Montassir, “Le mouvement du 20 février, une révolte virtuelle?” dans Baudouin Dupret et al. (dir.), *Le Maroc au présent: D’une époque à l’autre, une société en mutation*, Casablanca, Centre Jacques-Berque, 2015, pp. 663 – 664.

② “Le Maroc se dote d’une loi pour généraliser l’usage de la langue amazighe,” *Jeune Afrique*, 11 juin 2019, <https://www.jeuneafrique.com/787082/societe/le-maroc-se-dote-dune-loi-pour-generaliser-lusage-de-la-langue-amazighe/>.

柏柏尔语官方化既是柏柏人长期不懈抗争的结果，也反映了摩政府内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摩洛哥独立以来，非斯家族（原指居住在摩洛哥北部古城非斯的家族，现泛指融合了穆斯林文化和安达卢西亚传统的精英群体）占据摩洛哥政坛的中心地位，垄断着摩洛哥政治权力。哈桑二世时期对柏柏尔人的压制政策使在政府中工作的柏柏尔人不敢显露其身份属性。穆罕默德六世对柏柏尔群体及文化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使柏柏尔人在政府中的占比逐渐加大，柏柏尔人组织迅速增多。^① 20世纪70年代，仅有40多个柏柏尔社团，现今已有近千个柏柏尔社团。2005年由律师作家艾哈迈德·哈吉（Ahmed Dghahi）成立的摩洛哥阿马齐格民主党（Parti démocrate amazigh marocain）于2007年被内政部禁止活动。2020年1月，阿马齐格政治行动党（Front de l'action politique amazighe）成立，并于2020年底与两个政府多数党全国自由人士联盟和人民运动结成联盟，准备参加将于2021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② 此前，柏柏尔人长年采取抵制参加选举的策略来抗议政府针对柏柏尔人的边缘化政策。此次阿马齐格政治行动党准备参加竞选象征着其政治导向的转变，即由被动抵制转为主动融入，通过参加选举融入政治体系内部进而维护柏柏尔群体利益，表达和满足政治经济诉求。

2011年宪法将柏柏尔语官方化为柏柏尔人通向政坛打开了大门。柏柏尔人将在此基础上超越以往的语言文化诉求，通过参与政治经济改革的决策过程为柏柏尔人争取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尽管目前身份认同问题并非左右政党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但柏柏尔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开始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内涵。柏柏尔政党的组建并重返政坛是否会冲击由阿拉伯—安达卢西亚人主导的摩洛哥政坛，进而加剧柏柏尔人与阿拉伯—安达卢西亚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可能成为威胁摩洛哥政局稳定的因素之一。

① Fahd Iraqi, “Maroc: comment les Amazighs se sont imposés au sein de l’alliance gouvernementale,” *Jeune Afrique*, 11 mai 2017, <https://www.jeuneafrique.com/mag/433563/politique/maroc-amazighs-ont-conquis-pouvoir/>.

② Hassan Toumi, “Au Maroc, baptême électoral pour le Front amazigh,” *Jeune Afrique*, 19 janvier 2021, <https://www.jeuneafrique.com/1106499/politique/au-maroc-bapteme-electoral-pour-le-front-amazigh/>.

四 摩洛哥政治发展的前景及挑战

“2·20”运动是摩洛哥政治转型中的标志性事件,暴露和激化了摩洛哥社会的固有矛盾。如何把握宗教传统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平衡,发挥和强化政党的政治功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是摩洛哥民主化面临的挑战。

(一) 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决定摩洛哥民主化的方向

在摩洛哥宪法中规定伊斯兰教是摩洛哥国教、国王是“信士的长官”。因此伊斯兰教是摩洛哥政治的天然组成部分,在摩洛哥探求民主化道路过程中伊斯兰教始终是政治基色,在摩洛哥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独立以来,摩洛哥的民主化进程表明传统宗教与现代民主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并且可以相互融合,而君主制作为延续下来的历史传统成为保障政权稳定的同时探索民主化道路的前提。^①

“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政党在北非多国上台执政,温和派伊斯兰政党正发党也通过议会选举在摩洛哥上台执政。正发党将伊斯兰教、国家统一、制宪君主制作为其维护的价值,认为《古兰经》可以作为约束道德的工具应用于国家治理,但正发党不要求《古兰经》成为国法,也不强迫所有民众信仰伊斯兰教。正发党在承认摩洛哥伊斯兰教性质以及王室领导地位的同时,力图通过民主改革解决民众面临的社会问题,迎合了民心求变这一现实。作为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执政党,正发党根据情况不断调整战略,在处理公共事务的同时与国家和王室保持着平衡。但是,由于王室对其权力限制,正发党在政治经济改革中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益减弱。尽管正发党上台加快了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的结合,但其差强人意的执政成绩可能使摩洛哥民众逐渐失去对伊斯兰政党的信任和期望,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以何种形式结合起来将充满不确定性。

① Hynd Saidi Azbeg, *Processus de démocratisation et monarchie constitutionnelle au Maroc*,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de Bordeaux Montesquieu, 11 décembre 2014, pp. 204 – 208.

（二）政治阶层的脆弱性是摩洛哥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政党是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也为政治行为提供结构化引导。因此，专业的政治阶层（即政党）在一国的民主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摩洛哥民主化的推进需要建立以政党为核心的领导力量来实现广泛有力的政治动员。然而，摩洛哥经历了多次政治改革却没有形成强有力、专业稳定的政治群体。摩洛哥政党基础薄弱，难以在摩洛哥民主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摩洛哥政党的脆弱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党的组织能力和内部建设水平。大多数摩洛哥政党没有严格的管理章程，而以摄取个人或团体利益为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是民众对政党的不信任。在多数民众看来，政党是无用的，通过拒绝参加选举来对政党不作为进行惩罚。政党的系统性脆弱导致民众缺乏政治坐标和政治归属感。政党通过利益交换等方式获取选票的行为削弱了民众对民主的信心和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脱离群众的摩洛哥政党削弱了其合法性和号召力。

政党的脆弱性给摩洛哥留下了政治真空地带，孤立个体的诉求很难建立政治存在感。为填补政治真空，王室通过成立委员会来建立执政型君主制（monarchie exécutive）。^①在以执政型君主制为特征的政治格局中，政党再次被边缘化。王室加强政治统治权力除了维护王室利益需要之外也是政党和其他政治机构的弱势和低效导致的客观结果。政党的政治动员是以推进民主化、民主发展为目的，而国王引领下的民主化进程仅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即防止国家陷入社会混乱。因此，政党的政治改革可以是主动的，而王室的政治改革大多是被动的。只有个体通过他们的政治倾向形成集体性力量（即政党），并且政党通过民主实践和执政能力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政党才能拥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摩洛哥的政治发展才能脱离国王的控制。现今，随着街头抗议运动的增多和常态化，摩洛哥民众通过政党之外的渠道参与政治，但只有政党与民众形成政治改革的合力才能给摩洛哥民主化带来新气象。

① Fouad Abdelmoumni, “Le Maroc et le printemps arabe,” *Pouvoirs*, Vol. 2, No. 145, 2013, pp. 123 – 140.

(三) 王室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民主改革

如前所述,国王的合法性一方面建立在传统君主制和伊斯兰教之上,另一方面来源于民众对君主的拥戴,而这种拥戴是建立在满足民众诉求之上的。穆罕默德六世是一位锐意进取、勇于改革的国王,认为政权应为公民服务,“需要使每一个摩洛哥人享受到公民权利”,只有民主发展才能保证社会契约的延续。穆罕默德六世致力于推进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不断进行民主尝试,通过多次民主改革和修宪来推进改革和自我革新,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实现王室和民主相互适应。

穆罕默德六世在 2019 年新年讲话中指出发展模式问题是摩洛哥社会和地区发展不平等的根源,摩洛哥应制定以包容性发展为目的的改革措施,并成立专门委员会分析和评估摩洛哥面临的发展困境并寻找相应的解决措施,以回应摩洛哥各界民众的抗议和不满。穆罕默德六世宣布将建立“囊括所有摩洛哥公民的新型社会契约 (nouveau contrat social emportant une adhésion unanime)”,以显示王室的执行力与亲民程度。^①穆罕默德六世通过政治体制的技术官僚化,即重视发挥技术官僚的作用来推行改革。穆罕默德六世创设专家委员会并任命 35 名高校、商业及其他行业的精英代表为委员。^②这一举措在政治上确保了王室对国家事务的直接掌控,将政府置于单纯的管理执行者位置,纳入国王制定的发展战略规划,但其经济效果仍难以判定,平衡宏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十五年内实现社会经济新契约为目的的“新发展模式规划”被打乱。由于非正式经济活动占比高,对外依赖程度高,疫情对摩洛哥的冲击较大。2020 年摩洛哥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7.0%,经历了 1995 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③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摩洛哥

① “Discours intégral du Roi Mohammed VI à l’occasion du 66e anniversaire de la Révolution du Roi et du Peuple,” *Atlasinfo*, 20 août 2019, https://atlasinfo.fr/discours-integral-du-roi-mohammed-vi-a-l-occasion-du-66e-anniversaire-de-la-revolution-du-roi-et-du-peuple_a102860.html.

② Beatriz Tomé-Alonso et Marta Garcia de Paredes, “Vingt ans de règne: Mohammed VI, à la recherche de l’occasion perdue,” *L’Année du Maghreb*, No. 23, 2020, pp. 245–268. DOI: <https://doi.org/10.4000/anneemaghreb.6741>.

③ “La banque mondiale au Maroc,” Banque Mondiale, 1 octobre 2020, <https://www.banquemondiale.org/fr/country/morocco/overview>.

结构性弱点的同时，也凸显了摩洛哥政权的反应适应能力。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了民众的不确定感，对公共卫生造成冲击，但也将加速摩洛哥经济改革。为缓解疫情冲击，在王室的号召下摩洛哥政府启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资助，创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殊基金”，上万家企业共获得1200亿迪拉姆（约110亿欧元）的资助，近1/5的摩洛哥家庭按月领取国家补助，并承诺5年之内实现社保全民覆盖。^① 摩洛哥在短时间内采取措施，迅速生产口罩等物资设备并出口到欧洲、非洲的主要国家。^② 与此同时，摩洛哥是最早在全国范围普及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③ 疫情使摩洛哥陷入危机的同时，也加速了改革的推进，摩洛哥政府在王室的引导下化危为机。正在酝酿的新经济模式将助推经济复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21年摩洛哥有望实现4.5%的经济增长，^④ 预算赤字由7.5%下降到6.5%。

可见，摩洛哥王室依旧在推进民主改革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君主制作为延续下来的历史传统是摩洛哥政权稳定的保障。与此同时，为巩固其合法性，摩洛哥王室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推进现代化的道路，其政治经济改革的决心和力度将决定摩洛哥政局的稳固程度，也决定着摩洛哥君主政权的存亡。

结 语

“2·20”运动的爆发将摩洛哥卷入“阿拉伯之春”的旋涡。摩洛哥政

-
- ① “Covid-19: Comment le Maroc met en oeuvre un plan massif pour soutenir l'économie et protéger les populations,” *Forbes*, 6 avril 2020, <https://www.forbes.fr/politique/covid-19-comment-le-maroc-met-en-oeuvre-un-plan-massif-pour-soutenir-leconomie-et-protger-les-populations/>; “Le roi fait des annonces fortes: 120 Mds de DH à injecter dans l'économie,” *laquotidienne*, 29 juillet 2020, <https://fnh.ma/article/laquotidienne/le-roi-fait-des-annonces-fortes-120-mds-de-dh-a-injecter-dans-l-economie>.
 - ② Myriam Ben Yahia, “Coronavirus: le Maroc a exporté plus de 18 millions de masques,” *Ilboursa*, 15 juin 2020, https://www.ilboursa.com/marches/coronavirus-le-maroc-a-exporte-plus-de-18-millions-de-masques_22833.
 - ③ Fahd Iraqi, “Covid-19: le Maroc, premier pays au monde à lancer une campagne de vaccination nationale,” *Jeunafrique*, 10 novembre 2020, <https://www.jeunafrique.com/1072023/politique/covid-19-le-maroc-premier-pays-au-monde-a-lancer-une-campagne-de-vaccination-nationale/>.
 - ④ Khalil Ibrahim, “Maroc: le FMI prévoit une croissance du PIB à 4, 5% en 2021,” *Apanews*, 2 novembre 2020, <http://apanews.net/news/maroc-le-fmi-prevoit-une-croissance-du-pib-a-45-en-2021>.

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在吸取他国教训的基础上成功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在王室的引领下,摩洛哥通过宪政改革实现权力关系的调整,重新定义摩洛哥身份认同的构成要素,维护司法独立和各项人身自由,推进摩洛哥民主化进程。然而,王室仍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其最终目的是集统治和治理于一身,维护国王的统治地位和君权神授的绝对权力。因此,摩洛哥国王主导下的民主化进程是以保障国家及王室政权的稳定为前提的,并非要实现权力的真正制衡与分享。在政党难以发挥其政治功能并日益失去民众信任的情况下,民众通过组织和参与社会政治运动倒逼摩洛哥政府推进改革。摩洛哥国王意识到解决民众的政治经济需求与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是确保君主政权稳定的前提,只有稳步适度地推进改革才能缓解摩洛哥社会的固有矛盾。2021 年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十周年,也是摩洛哥的大选年。摩洛哥各政党为了赢得大选进行利益重组,而正发党的统治地位面临其他政党的竞争威胁。但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新一届政府将落实“新发展模式规划”,继续深化改革,在后疫情时代继续探索平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新方案。

[责任编辑:张玉友]

bility, the opposing factions are movi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and the country is going towards stability and unity. However, the decade of instability has devastated its national power, external intervention continues, the country's future is facing challenges in many ways.

Keywords: Libya; Libyan Wa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ontinuation and Change: The “February 20” Move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orocco

Meng Jin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February 20” movement dragged Morocco into the whirlpool of the “Arab Spring”. Through constitutional reforms, Morocco respond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a timely manner, adjusted the political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redefined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Moroccan identity, and put Morocco on the fast track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However, the Moroccan political power center is still occupied by the royal family, the marginalized status of political parties has not changed, and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Moroccan economy and society will continue to exist for a long time. The “February 20” movement expanded Morocco's traditional political space and changed i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de. Moroccan people intensified the interactions with state power through social movements and cyberspace. This is a deeper change brought to Morocco by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Currently, how to grasp the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modern democracy,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re still challenges presented to the Morocco's democratization.

Keywords: Morocco; “Arab Spring”; Constitutional Reform;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Berber Culture